

针刺麻醉 资料选编

2

北京人民出版社

针刺麻醉资料选编

(二)

北京针麻协作组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

針刺麻醉資料选編

(二)

北京針麻协作組編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經售處北京發行所發行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1973年9月第1版 1973年9月第1次印刷

書号：14071·5 定价：0.38元

(内部发行)

毛主席语录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目 录

经络学说的形成和发展

..... 广东中医学院 经络研究协作组 (1)

经络敏感人经络现象的初步研究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九医院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经络研究协作组 (16)
北 京 大 学 生 物 学 系

唇针麻醉的临床应用和初步体会

..... 江苏灌云县人民医院 (58)

经络——穴区带针刺麻醉在五官科手术的应用

..... 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穴区带疗法研究小组 (68)
眼、口腔、耳鼻喉科

从临床实践谈对经络的认识

..... 保定地区中医院 经络协作组 (82)
安 新 县 医 院

经络学说的形成和发展

广东中医学院 经络研究协作组

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贯串在祖国医学的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等各个方面。千百年来，它不仅是中医论证疾病所依据的基本理论之一，而且一直指导着中医各科的医疗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革命医务人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敢于实践，大胆创新，把传统的针灸疗法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实践又不断向人们提出许多研究课题。例如：人体究竟有没有穴位？经络的实质是什么？目前人体解剖看不见经络，它是不是古人虚构的东西？用经络理论解释针刺作用原理是否科学？等等。这些问题与人们对经络学说本质及其科学价值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应当如何正确看待祖国医学的经络学说呢？毛主席教导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为了进一步探讨和全面认识经络理论的本质，正确衡量它的科学价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经络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作一次考察是有价值的。通过溯流寻源，认识经络的本质，发掘它的精华，使它更好地为现代医疗实践服务。同时，也为当前探讨针治、针麻作用原理和经络的实质提供一定的

参考资料。

一 从穴位的发现到经络学说的形成

经络学说在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这种理论是怎样产生的呢？是古代某名医凭“天才”臆想出来的吗？不是。“**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经络学说来源于实践，它是古代针灸医疗实践中的产物，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为了探讨这种理论的形成过程，我们得从人体“经穴”的发现这一点谈起。

人体穴位的发现和针灸治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制作石器作为劳动工具，并懂得了火的使用。在生活、生产实践中，人们发现体表偶然被火灼伤，被碎石砸伤或被荆棘刺伤后，能使体内某些疼痛和疾患减轻或消失。经过无数次这样的反复实践，于是积累了经验，逐步学会使用一种“砭石”为针，刺激体表的一定部位（或压痛点）来解除体内疾病的痛苦；又懂得用火点灼灸某部位的皮肤，以达镇痛等疗效。从灼伤处到砭灸处，是属于一种“以痛为俞”的体表浅刺的外治法，这是古老的针刺和灸术的萌芽时期。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冶金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针刺用具也逐步得到改进。人们学会以金属造针，制作各种类型的针具，于是有所谓“伏羲制九针”的传说^①。根据殷墟出土文物考证，我国商代已是青铜器的全盛时期，手工制造的各种青铜器具十分精致，作为针刺用的金属针大致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九针”的应用无疑是针灸医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为穴位和经络现象的发现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过去使用砭石或粗大的骨针，

^① 见《帝王世纪》。

刺的范围是一个较大的“面”，而且不可能深刺，致使疗效受影响。使用金属针以后，针扎在比较准确的固定“点”上，深刺时能产生明显的针感传导现象。从“砭灸处”到“针灸点”，从浅刺到深刺，针治疗效大大提高。又经过反复的临床实践，逐步摸索出每个“针灸点”治病的特殊作用，为了便于传授和记忆，于是给常用的“针灸点”定位定名。穴位的名称也就从临床实践中产生出来。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又逐步体会到：针刺四肢穴位常有一种异常的感觉向一定的方向传导，而这种传导和针治的疗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后来《内经》称为“得气”，比喻为“针游于巷”^①，现代称为“经络现象”）；并发现在四肢部位的上下邻近穴位都能治疗同一类性质的疾病，而针刺的感应正是通过这些穴位向上下传导的。这种从治疗上和感应上的联系，使人们认识到穴位之间实际贯串着一条机能的路径。这种联系不仅反映在体表上，而且发现同体内脏器有着沟通表里的关系，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点”到“线”，从局部到整体的认识，是古代经络概念形成的重要起点。后来又经过许多医者们的努力，进一步辨别各部位上点和线的病理反应及主治疗效的特点，并在线上又发现许多新的点，还逐步探索出各条路径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就这样“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实践使人们对经络的认识不断深化，通过由点连成的线，同类归经，经上布点的归纳和总结，经络的完整体系便逐步形成。应该指出，前人在长期医疗实践基础上探索和总结出来的这种理论，至少有相当部分正确地反映了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及其规律性，抹杀或者夸大这种作用都是不正确的。

经络概念的形成，不仅建立在针灸临床实践基础上，而且也有

① 见《灵枢·邪气藏府病形》：“中气穴，则针游于巷；中肉节，即皮肤痛。”

一定的解剖实践为依据。《史记》里有关于上古时代医者俞跗用割腹疗法来治病的记载^①。它反映了古人从临床实践的观察中，对人体生理结构及功能的初步认识。后来，在《内经》里对解剖人体观察脏腑血脉更有详细的记载。如《灵枢·经水》篇说到“……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对于人体脉管的解剖观察，《汉书》也曾有一段关于“量度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的记述^②。可见当时进行解剖的动机是为了医学需要。古人通过多次解剖实践所获得的感性认识，和针灸临床的体验结合起来，加深了对经络的认识。因此，后来《内经》对十二经脉（即经络主干）的起始、循行、络属及其功能活动的描述，对于经脉和脏腑、气血、脑髓等关系的论述，都有着许多合理的成分和科学的内容。二千多年以前能有如此重要的发现，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一个卓越的成就。

从经络现象的发现到经络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医者们迫切需要对这个概念所反映的经络路线体系，作出理论的说明和解释。那么，古代建立经络理论的思想基础是什么？经络学说和其他科学理论的产生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我们认为，包含着朴素唯物论因素的古代“阴阳五行”说是经络理论构成的思想基础。这种古代的宇宙观起源于西周时代。起初，它是在古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分别用“阴阳”二气来探求与解释自然现象的变化；用“五行”（以金、木、水、火、土为代号）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构成。如在《周易》、《尚书》、《国语》等史籍里都有记载。春秋时期，“阴阳”二

① 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醪酒，饕石撬引，案抚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及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

② 见班固：《汉书·王莽传》。

气说发展为“六气论”。《左传》即有“生其六气，用其五行”的记述。这时阴阳和五行已合成一体，并开始运用到古代医学上来，作为探求和认识人体一切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的一种方法论。例如在《礼记·月令》篇里，有五行配五藏的说法，在《左传》里（公元前541年）亦记载有秦医和的“六气”致病说；在《内经》里的阴阳五行已作为一种学说，用来阐明人体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各个方面的关系。如《素问》说：“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身之藏府中阴阳，则藏者为阴，府者为阳”^①。医者们并把经络的十二条主干，即十二经脉分别同阴阳相配偶，再与三阴三阳（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相配合，按各经脉内连脏腑，外络肢节的联系，于是构成手足各三阴三阳的十二经脉体系。可见医者们为了摆脱古代有神论的唯心主义影响，而运用“阴阳五行说”作为经络理论构成的思想基础，这样不仅使经络学说比较客观地反映人体某些生理现象及其内在联系的规律；反映人体与自然界变化相适应的活动规律，而且医学的实践，又丰富了古代朴素唯物论的科学内容。所以说，经络学说是古代医者们长期辛勤劳动与集体智慧的结晶。从历史发展来看，它是属于进步的、合乎科学发展的、并且具有朴素唯物辩证思想的医学理论。

二 《内经》成书是经络学说体系形成的标志

《内经》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它总结了春秋战国以前我国人民的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关于它的成书年代，虽有各种说法，但从各方面考证看，认为《内经》产生于战国中后期，秦汉时续有补充，至唐代王冰又进行过一次增删修订，这种看法

^① 见《素问·金匱真言论》。

比较可靠。在东汉初班固的《汉书》和刘歆的《七略·艺文志》里，都提到《黄帝内经》计 18 卷。可以肯定，《内经》绝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或一时之作，而是经历了周末至秦汉无数医者共同劳动创造的产物。

在《内经》成书时期，经过医者们长期努力所创立的经络理论，至此便成为一整套经络学说体系。然而必须指出，经络概念及其原始的理论却早于《内经》之前已产生。从上述经穴的发现到经络理论的形成中，可以察看到这一点。下面我们再作一些考证和分析。

针灸与经脉早已是远古“三世医学”中的组成部分，后来又发展为“医经”诸家，有著作二百余卷，《黄帝内经》只是其中的一家，医经各家所论述的都包括有人体血脉经络等各种医学理论^①，可惜医经的原始文献绝大部分早已佚失，无从可考。然而，我们从其他史籍文献里，还能看到《内经》以前经脉源流的一点线索，可作为探讨经脉起始年代的旁证。

公元前七世纪，在一篇反映管仲（春秋前期齐国人）哲学思想的著作里，提到“血气”和“筋脉”的概念及其互相关系。《管子·水地》篇说：“水者地之血气筋脉之通流者也。”^②（“筋”是指“经筋”，后来《内经》有所谓“十二经筋”；“脉”就是“经脉”，是血气通流之路径。）从这个生动的比喻里，说明当时人们对人体内经脉运行气血的生理功能早已有了认识。其后，在《周礼·天官》篇里也有“以身养筋，以威养脉”的记载^③，也说明古人注意到药性五味与涵养筋脉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里，

① 见《汉书·艺文志》：“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生死之分。”

② 见《管子·水地》：“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水者地之血气筋脉之通流者也。”

③ 见《周礼》卷五《天官冢宰下》。

保存和反映了公元前五世纪扁鹊生平医疗活动的史实。其中就有扁鹊运用经脉于针灸治病的记述。如扁鹊说过：“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①当他为赵简子治病时又说：“血脉治也，而何怪！”扁鹊并曾施用针石取“外三阳五会”穴，治愈了一种“尸蹶”病。他还详细分析了“尸蹶”的病因，其中谈到了“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等语^②。可见，公元前五世纪的扁鹊年代，已有“阳脉”、“阴脉”、“中经维络”、“绝阳之络”等概念，有“三阳五会”的穴名^③。如果当时医者还没有对手足三阳经脉交会的认识，又何以存在这类概念呢？扁鹊善长针灸，精通经脉是无庸置疑的，所以司马迁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④。这说明经脉的理论在那时已经产生，并指导着医者临床诊断和针灸施治。后来庄子也借脉为喻，引用“缘督以为经”等语来申述自己的哲学观点^⑤。这也说明经脉的理论不仅为医者所用，而且也为人们所熟悉了。后来在《内经》里，也有关于上古时代医者俞跗季“理色脉而通神明”的记载^⑥；并用上古医籍《上经》、《下经》、《热论》、《本病》、《奇恒阴阳》等论篇来阐述经脉的理论。此外，在西汉末刘向所作的《说苑》里，亦提到上古医者俞跗“炊灼九窍而定经络”的记载^⑦。经络虽不是靠一两两名医来测定的，但这段史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络形成的年代。

① 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② 同上。“扁鹊曰：‘若太子病，所谓“尸蹶”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缠缘，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

③ 见《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中刘向：《说苑》及《韩诗外传》。

④ 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⑤ 见《庄子·内篇·养生主》。

⑥ 见《素问·移精变气论》。

⑦ 见刘向《说苑》：“中古之为医者曰俞跗，俞跗之为医也，掘脑髓，束育英，炊灼九窍而定经络”。

因此，我们根据以上的考证认为，古人认识经脉为血气运行的路径而形成经络的概念，不会晚于公元前八世纪（即西周至东周前期）；而运用阴阳五行解释经脉的原始理论也不会晚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即春秋晚期）。直到《内经》时期（公元前三世纪），医者们把前人留下的论著作了第一次系统的总结，并在整理的基础上加以阐述和发展，于是产生了经络学说的理论。

《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计 24 卷、162 篇，其中不少论篇对经络学说有详细的记载。如《灵枢》有经脉、经别、经水、经筋、营气、卫气、脉度、营卫生会、血络等篇；《素问》有气穴、气府、骨空、脉解、调经等篇。其内容丰富，经论精晰。对于经络学说的本质，我们作如下初步的分析：

（一）经络学说是从整体论观点出发，探求人体的生理功能活动和病理变化，通过对临床实践中来的感性认识进行概括和推理，作出反映某些客观规律的认识。医者们在长期的针治临床实践中，发现人体内存在一种经络功能，并指出它既是运行气血，营养全身，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渠道^①；又是一种沟通表里内外联系的传导途径^②。从形态上来看，《内经》描述经络分为“经脉”和“络脉”两大类。经脉是主干，共有十二条，其所处部位“深而不见”，此外还有十二经别和奇经八脉，都属于经脉的范畴；络脉是十二经脉的支干，“浮而常见”，比络脉更小的有孙络（也称“浮络”或“血络”），它们象罗网一样遍布全身^③。同时，十二经脉和体内各脏腑分别相连属，并与体表的经筋、皮部相贯通。其中六条经脉分布在上肢，与头部、胸部相联系；另外六条分布在

① 见《灵枢·本藏》：“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

② 见《灵枢·海论》：“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

③ 见《灵枢·脉度》：“经络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灵枢·经脉》：“经脉者，常不可见也”，“脉之见者，皆络脉也”。

下肢，也连结着躯干与头部。这样，经络便把人体各部位器官与组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为统一的整体。可见，古人所描述的经络是有物质基础的。经络与神经系统是有密切的关系，但不能等同于神经系统。从功能上看，它既是一个循环调节系统，同时，又是一个具有传导性能的联络网。而且它还有反应病变、抗御病邪等特殊作用，这都是临床实践所证明了的。所以说，经络不是什么古人“虚构”的东西，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体某些生理与病理现象的规律性的认识，对于中医各科临床治疗有着指导的意义。

（二）从《内经》记载看，人体内的气血在经脉里循环输注流动，主要表现为各经相互衔接而成上下纵行的形式走向。《灵枢·经脉》篇有详细的描述，在《逆顺肥瘦》篇里也作了简明的概括。它指出：“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古人对这种经脉纵行走向的描述，主要是建立在临床实践中对针刺感觉传导路线的认识上。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经脉的联系，还有交错形式和分段形式两种。交错表现为经脉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络交会。例如常脉与奇经的交会，十二经别的走行，十五络及无数络脉、孙络脉的联系，还有各经交会穴之间的特殊路径等等；分段反映在经络学说中的“气街”说，即所谓“胸气有街、腹气有街、头气有街，胫气有街”（《灵枢·卫气》），“四街者，气之径路也”（《灵枢·动输》）。《内经》描述了人体内存在这四条“经气”的径路，它们分别与头部、胸部、腹部和下肢沟通联系着。这种属于分段式的联系路径，和现代生理学的神经节段性分布有相似之处。以上三种循行路线（纵行、交错、分段）都是相互配合、不可分割的，从而构成为完整的经络体系。这个体系表明了人体内各部分是按一定规律发生联系的。为此，我们应当结合临床实践给予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挖掘其精

华，进一步丰富和加深我们对人体生理功能的认识。

(三) 关于经络与大脑的关系问题。过去有人认为经络体系忽视了大脑的作用，便说这种理论“不科学”。其实，这是对经络学说的误解。在《内经》里早已有关于“脑为髓之海”的论述。古人认为脑是一个“奇恒之府”，并指出人体正常生理机能活动及症候的发生，和“脑髓”的“有余”与“不足”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灵枢·海论》篇说：“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痠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而脑髓的正常活动依靠什么来维持呢？《灵枢·五癰津液别》篇指出是靠“五谷之津液”来“补益脑髓”的；《大惑论》篇也认为是由于“五脏六腑之精气”、“上属于脑”的结果。那么脑髓与经脉又有什么内在联系呢？《内经》许多论篇都描述了各经脉（包括奇经八脉）和脑髓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其中如“足太阳之脉……从巅入络脑”（《素问·热论》）；督脉“上额交巅上入络脑”（《素问·骨空》）；手少阳“别于巅”（《灵枢·经别》）；“足阳明之别……上络头项，合诸经之气”（《灵枢·经脉》）。这说明脉是直接和脑发生联系的。此外，古人已认识到“眼系”与脑也有内在联系，《灵枢·大惑论》里就有从“眼系以入于脑”的记载。所以部分经脉是通过面部的“眼系”而传至脑的。其中如任脉“上颐循而入目”（《素问·骨空》）；手少阴脉“其支者，从心系，上挟咽，系目系”（《灵枢·经脉》）；足厥阴脉“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灵枢·经脉》）；还有阴阳二跷脉也是在脑内与足太阳脉发生关系的^①。总括言之，“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②。可见各经脉进行沟通表里、联系上下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上达脑髓而发生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古人对大脑中枢部位的特殊作

① 见《灵枢·寒热病》。

② 见《灵枢·邪气藏府病形》。

用认识还很肤浅；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我们不应苛求古人，也不能由此视之为糟粕而加以全盘否定。

总之，我们看待祖国医学的经络学说，必须正确区分其精华与糟粕。对于从实践中来，经过总结提高之后，又能指导临床实践的认识或理论，都应归属于精华部分，给予继承和发扬；而对某些内容，带有主观臆想成分，或是不切合实际的推理，或有牵强附会的比喻和形式（如十二经应十二月，三百六十五络以应一岁等），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剔除，而“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只有在批判中继承，在发掘中提高，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是应有的态度。

三 经络学说的发展及其科学价值

经络学说自《内经》之后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其演变发展的过程，同历代医者在临床实践中经验的总结与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内经》时期的经络理论是后世医者继承和发展的根本依据。例如比《内经》稍后一些的有《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此书相传是公元前五世纪秦越人（扁鹊）所著，它也可能是后人所依托的。《难经》是继《内经》之后，对前者的医学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书里采用问答质疑的方式来解释经义，其中不少篇幅是论及经络、经穴问题。例如对经脉里“正经”与“奇经”的关系有所阐述和发展，所以，李时珍认为此书“发灵枢未发之秘旨也”^①；又如经脉八会穴的记述，也是在《难经·四十五难》里得到概括，这是古人在不断临床实践中认识经穴特异性的又一总结；还有《四十七难》关于“人头者，诸阳之会”的一段论述，也是对《内经》所谓“诸阳之会，皆在于面”的进一步阐

^① 见李时珍：《奇经八脉考，奇经八脉总说》。

述。以上只列举其中一二，由此可见，《难经》的理论对于经络学说和针灸学术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自《素问》、《难经》之后，经络学说在不断演变发展和应用着，如东汉的张仲景在临床实践中对经络理论加以阐述和运用。在他的《伤寒论》里十分强调经络的重要性。他说：“凡要和汤合药、针灸之法，宜应精思，必通十二经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以《内经》经络理论为依据，观察病邪侵犯经络、脏腑由表及里的传导过程，寻找出伤寒发病的规律。

经络学说在指导针灸治疗过程中，也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发展和提高。如晋代医者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对经络、经穴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不少的贡献。他总结秦汉以来针灸医学的成就，根据《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书，作了精要的辑录和系统的整理，“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①，编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共12卷，计128篇)。书中70篇是阐述经穴的，它对经穴的记载也有其特色。该书不仅对后世研究经络与临床有指导意义，而且后来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地位，如对日本就有较大的影响。据史料记载：北齐河清元年(即公元562年)我国吴人知聪携带《明堂图》及《甲乙经》等160卷古典医籍到日本，后来日本规定医学生必修的我国古典医书中，《甲乙经》是其中的一本。

早在南北朝时期，我国已绘制有经络针灸腧穴图，据现存敦煌残卷中，还保存着部分残帙。到唐代已出现有彩色绘制的人身经络腧穴图。至宋代经络与针灸临床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王惟一(公元1026年)根据经络学说分经布点铸成“铜人”两具，并写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统一了宋以前各家有关经络和

^① 见皇甫谧：《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